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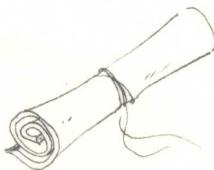
中国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古学纵横

刘小枫 陈少明 ●主编



元代四书学研究

周春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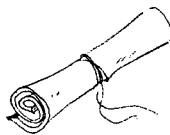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卷之四

古学纵横

刘小枫 陈少明 ●主编



元代四书学研究

周春健 ●著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四书学研究 / 周春健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08

(经典与解释 中国传统)

ISBN 978—7—5617—6372—8

I. 元… II. 周… III. 四书—研究—中国—元代 IV.

B2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9738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
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中国传统 经典与解释

元代四书学研究

周春健 著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5.75

字 数 32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6372—8/B·436

定 价 3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缘 起

晚清以降，西学入华，华夏道术分崩离析，我国学术和教育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局——晚近十余年“奋不顾身”的现代化使得华夏学术和大学教育显得更为面目不清。整顿大学文科、重新铺展学术的基本格局，已然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学术课题乃至新时代的艰巨使命——太平之世必有文治。

问题是，如何整顿和重新铺展？

现代西学入华以来，我们要么不断竞相追逐西方“显学”（某种现代学说），要么与西方“魔怪”搏斗。令人深省的是，即便发扬自家传统的种种当代儒学论说，几乎无不依傍种种西方现代论说——从康德哲学出发又或依照韦伯社会理论重新解释儒家传统，一度被看作最精彩的儒学“新解”，与西方学术晚近两百年来用种种现代“学说”瓦解自家古典传统别无二致——如今，这一局面因与西方后现代学术接轨而变得更为触目惊心。

与西方学人一样，现代之后的中国学人不得不在两条道路、

两种“命运”面前作出自己的选择：要么跟从种种“后现代主义”以比现代精神更为彻底的解构方式破碎大道，要么切实回归古典学问——倘若选择后者，势必首先质疑并革除我们自“五四”以来养成的凡事以现代观点衡量古典的新传统。

如何重新获得已然丢失的古典传统，关系到中国学术未来的基本取向和大学教育的基本品质。现代中国学术的视域基于现代西学，由于对古典西学缺乏深入细致的理解，数代中国学人虽不乏开创华夏学术新气象的心愿和意气，却缺乏现代之后的学术底气和见识根底。因此，积极开拓对西学古典传统的深入理解，当是未来学术的基本方略——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重读自家的历代经典时才会有心胸坦荡、心底踏实的学术底气，从而展开广阔、深邃的学术新气象。

晚近西方学界方兴未艾的“古典政治哲学”表明，西方学界和大学教育正在踏上回归古典学问之路——取向虽然是古典的，其生存感觉却是现代之后的。“古典政治哲学”绝非一种学说或“主义式的”论说，换言之，不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显学”一类的东西，更非所谓“新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基本的学问方向：悉心绎读经典大书，凭靠古典智慧来养育自己的心性。如此学问方向基于万世不绝的古典心性；既然是一种心性，古典学问唤起或寻找的便只会是有如此心性的学人，并激励“我们”自觉杜绝种种“盲目而热烈”的“后”学或“新”说（尼采语），挽回被现代文教体系的学科划分搞得支离破碎的学问大体，进而而在我们的大学中寻回自身的地盘……在近两百年来的西方、近百年来的中国，古典心性流离失所，已然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学堂。

继“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我们推出“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首先要表明：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收拾

我们自家的传统经典，乃中国学术新气象的根底所在；其次要表明：我们志在承接清代学人的学术统绪，进一步推进百年学人的积累——如今我们能否取得世纪性的学术成就，端赖于我们是否能够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拥有自己古传的历代经典。中国古代学术以绎读经典为核心和传统，历代硕儒“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的学术抱负和“皓首穷经”的敬业精神，在今天需要我们从自身的语境出发重新发扬光大。

本系列不拘形式——或点校、注释尚为善本的古书，或重新绎读（疏解）历代典籍，或汇编百年来的研究成果以文集方式追踪某个专题……唯一谢绝的是中西比较之论或种种现代一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或文化研究一类高论。

古人云：“有志者事竟成焉”。

刘小枫 陈少明

2005年10月於中山大学哲学系

序

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必然产生与其地位相称的伟大经典。这种伟大的经典，诚如美国学者阿德勒所言，“每一部书都以独特的方式提出人所必须面对而且经常发生的基本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从不曾完全解决，这些书便成为知性代代相传的来源与不朽名作”。当然，这些经典虽然以最清晰、最简单的方式描写人类心灵所面对的最困难的主题，却不容易读。伟大书籍含有多层深意，自然便显示它的富丽，它们引出了各种注解，“其他书我们只要读一遍就能洞悉无遗，但是伟大的书籍，却让人钻研不尽。它们是启发智慧的源泉，永不枯竭”。宋代理学家极为推崇的《四书》，就是这样的经典，这样经得起不断诠释的伟大的书籍。

《四书》是由《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聚合而成，这四部书成为儒学核心典籍，是历史选择的结果。《论语》、《孟子》不用说，二书反映了孔子、孟子的基本思想和政治主张，历来为统治者和士人所重视，尤其是《论语》，汉唐千百年间被视为士

人务必精熟之书。《大学》、《中庸》相传分别为孔子的弟子曾参、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内容涉及安邦定国的根本理念和深奥的心性哲学，自汉代起，也逐渐为人所重。《汉书·艺文志》中，有《中庸说》两篇；《隋书·经籍志》中，有刘宋散骑常侍戴顒《礼记中庸传》二卷、梁武帝萧衍《中庸讲疏》二卷、《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至唐代，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为了对抗佛教，给自己的“道统”说寻找经典依据，特地挑出《大学》，着力加以宣扬。而其弟子李翱，则尤为尊信《中庸》。至宋代，学者致力于理学的建构，以上几部书继续受到推崇，为《孟子》一书还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其间，程颢、程颐兄弟二人的努力起了重大作用。当然，“四书学”的正式确立，还得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为标志。

在理学家眼中，晚于《五经》（或《六经》）的《四书》体现了《五经》修身齐家、治国安邦的基本精神，而更为简明扼要，易于为广大士人理解。朱熹在讲到《四书》与《五经》的关系时，曾打了一个比方，说前者是“熟饭”，而后者是“禾”（打禾为饭）。“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经过理学家的努力，儒家典籍诠释的重点，从“经”转变为“传记”，经学形态也由训诂转变为义理。对于这种历史性转变，学术界的讨论是相当充分的，成果堪称丰硕。

四书学之兴起，在思想家看来不外乎抉发“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但社会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对它的接受却不是同步的。朱熹在世之时，并未因作《四书章句集注》而获荣宠，反倒因党禁受贬抑，其学术被诋为“伪学”而遭禁锢。直到死后二十多年，朱熹的政治、学术地位才获得追认。说来真是有点不可想象，真正使“四书学”大显于天下的，是在蒙元时期。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的科举考试，正式规定第一场即从《四书》内出题，并只能依据朱熹的《章句集注》加以发挥，这就首次在国家制度层面确立

了四书学的官学地位。对于尊崇四书学的人来说，真该三呼“大哉乾元”了。目前，学术界关于元代四书学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尤其是缺乏专精的研究成果。于是乎，有了周春健君《元代四书学研究》的问世。

为了这部书的写作，作者在搜集材料上花了相当大的工夫。在掌握第一手资料，吸收前儒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对元代四书类著作全面排查，对书名、撰者、内容、佚文、流传、价值等加以简要考证，撰为《元代四书类著述考》，作为全书立论的基础。全书首先对金元之际四书学北传及元初蒙古统治者“以儒治国”的文化政策加以系统论述，以把握元代四书学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然后对四书学官学地位制度化的过程加以梳理，显现出元代四书学明显的科举化特征。接下来的几部分中，对元代四书学的地域与学术师承，以及北方和南方的传承谱系详加考索，展示了元代四书学真实而具体的成就和面貌。这对元代四书学的研究来说，是个不小的推进。书中认为，元代四书学的总体成就虽然不算高，却在学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尤其是学术与权力的有效链接，使四书学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最大程度的普及，以至影响中国社会数百年。这对思想史研究，对社会史研究，都具有启迪作用。

周春健君是山东滨州人，现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师。他从志学阶段即受齐鲁传统文化熏陶，企盼在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有所作为。2004年考取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生，旨趣在中国经学史。不久，即选定四书学为研究对象，时间断限几经变换，最后确定为蒙元时期。他天资聪颖，勤奋上进，在学风普遍较为浮躁的环境中平心静气，坐得下来，因而能在不太充裕的时间内写出合格的博士论文。作为导师，我是相当满意的。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就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当这部书被确定列入中山大学哲学系“经典与解释”丛书后，

他嘱我为之作序，在我自然是义不容辞。经典与解释是极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丛书组织学者说得好：“重拾中西方古典学问坠绪，不仅因为现代性问题迫使学问回味古典智慧，更因古典学问关乎亘古不移的人生问题。古学经典需要解释，解释是涵养精神的活动，也是思想取向的抉择。”既为学人，就要有所追求，追求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将古今学问与社会人生贯通起来。春健君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初涉斯域，即有所获。惟愿今后认定方向，孜孜不已，沉潜数载，必将卓有成效，达到新的境界。君其勤哉，君其勤哉！

周国林

2008年5月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序(周国林) / 1

导言 / 1

一、《四书》与“四书学” / 1

二、研究缘起及文献综述 / 6

三、写作构想与研究方法 / 13

第一章 元代四书学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 / 14

第一节 赵复与四书学北传 / 15

一、赵复北上传学始末考略 / 15

二、四书学北传与北方学风 / 20

三、杨惟中、姚枢与四书学传播 / 27

第二节 元初“以儒治国”的文化政策 / 30

- 一、元世祖前蒙古可汗与儒士儒学 / 31
- 二、忽必烈“儒治观”的形成及其反复 / 35

第二章 元代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 / 46

- 第一节 南宋至元四书学的历史命运 / 47
 - 一、“伪学”之厄：四书学与“庆元党禁” / 47
 - 二、从民间到官方：四书学与“端平更化” / 49
 - 三、传统的隔阂与弥缝：元仁宗前的四书学 / 54
- 第二节 “延祐科举”与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 / 60
 - 一、从“戊戌选试”到“延祐科举” / 60
 - 二、“延祐科举”与四书学官学地位制度化 / 65
- 第三节 官学地位制度化与元代四书学的嬗变 / 73
 - 一、官学地位制度化与元代学术风气的四书学转向 / 73
 - 二、官学地位制度化与四书学在元代教育领域的传播 / 76
 - 三、官学地位制度化与元代四书学的科举化特征 / 85

第三章 元代四书学的地域分布与学术师承 / 93

- 第一节 元代四书学的地域分布及其特点 / 94
- 第二节 元代四书学者学术师承考略 / 96
- 第三节 元代四书学分布格局再探析 / 122
 - 一、元代四书学江浙、江西行省的点状分布 / 122
 - 二、元代四书学区域流向之大势 / 125
 - 三、元代四书学分布格局探因 / 127

第四章 元代四书学北方诸学派 / 131

第一节 元代北方四书学的传承谱系 / 132

第二节 许衡与鲁斋学派的四书学 / 134

一、“《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 / 136

二、“一以朱子之言为师” / 144

三、“其言切近精实，人所易晓” / 152

第三节 刘因与静修学派的四书学 / 157

一、“取文公书，会粹而甄别之” / 158

二、“简严粹精，实于《集注》有所发焉” / 161

三、“《语》、《孟》，圣贤之成终者” / 168

第四节 陈天祥与《四书辨疑》 / 179

一、《四书辨疑》对《四书集注》的批评 / 182

二、《四书辨疑》对《四书集注》“或曰”等处的辨析 / 189

三、《四书辨疑》对《四书集注》的补阙 / 191

四、《四书辨疑》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取向 / 194

第五章 元代四书学南方诸学派 / 200

第一节 元代南方四书学的传承谱系 / 200

一、元代四书学宗朱学派的分脉 / 200

二、元代四书学南方其他学派 / 204

第二节 金履祥、许谦与北山学派的四书学 / 208

一、金履祥与《论孟集注考证》 / 210

二、许谦与《读四书丛说》 / 225

三、元代北山学派四书学的学术特征 / 241

第三节 吴澄与草庐学派的四书学 / 251

一、“朱子训释《四书》，微辞密意，日星炳如” / 252

二、“中古之统”、“近古之统” / 257

三、“于朱陆二氏之学互有发明” / 269

附录：袁明善《四书目录》佚文辑录 / 278

第四节 陈栎、胡炳文、倪士毅与新安学派的四书学 / 281

一、“(取)戾于朱夫子者删而去之” / 282

二、“惧诸家之说，乱朱子本真” / 289

三、“其(《四书大全》)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 / 293

结语 / 301

一、元代四书学的学理价值及学术史地位 / 301

二、元代汉儒的“夷夏观”与元代四书学 / 305

附录 元代四书类著述考 / 308

主要参考文献 / 476

后记 / 483

导言

一、《四书》与“四书学”

中国学术史上的“四书”是一个特定称谓，专指《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儒家典籍。《四书》的并行与结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四书”之名，起于朱熹。^①

所谓“四书学”，是指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典籍及其注疏著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学术活动或学术体系。这一活动或体系，以视四部书为一有机整体，认定四书之间有着规定的次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四书类小序》云：“《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 289。束景南先生称：“淳熙四年他（朱熹）还没有把四书合刻，到淳熙九年他在浙东提举任上把四书并为一集刻于婺州，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了。”《朱子大传》第十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页 410。

序和关联为学术前提。从属性上讲,四书学是中国学术史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八百余年的历史而言,四书学是一门显学。它的“显”,不仅表现在学术领域,而且表现在政治领域、教育领域以及广大民众的社会生活领域。清代汉学家惠士奇曾手书其“红豆山斋”之楹帖云:“六经宗服郑,百行法程朱”^①,准确地道出了程朱之学对清代社会的深刻影响,而此处所言程朱之学中,四书学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其实不惟清代如此,就大致趋势来说,南宋、元、明、清,四朝皆然。^②兹于四朝各举诗作一例,由之可窥四书学于社会各层面影响之一斑:

为学须知次第功,四书为本要精通。

不须妄起功名想,立得身时禄在中。^③

^① 语见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上。皮锡瑞《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云:“而惠氏红豆山斋楹帖云:‘六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是惠氏之学未尝薄宋儒也。”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227。以“服郑”为“孔孟”,然二字之差,一崇汉学,一崇理学,旨趣大异。参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宋明儒学综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27;又参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十六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页629。

^② 这里涉及到一个四书学的起点问题,有学者认为起于北宋,比如朱汉民、肖永明二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四书学与理学》,便讨论了濂学、关学、洛学、新学、蜀学等许多北宋学者的四书学思想;龚杰先生亦有文章《张载的四书学》表达此种观点,见《西北大学学报》,1994(3)。然“四书”称“学”,必须要以视四书为一有机整体及彼此存在内在关联为前提,而不能仅衡以是否以四部书或其中一两部书为研究对象,否则便失之于泛。南宋朱熹最早合并四书,定“四书”之名,规定“《学》、《论》、《孟》、《庸》”的治学次第,自此,研究《四书》及朱子四书学著作群者蔚然成风,遂绵延而成《四书》之“学”。因此我们认为,若为学术追本溯源固然可以及于北宋,但讲“四书学”还应当以南宋为起点。参刘泽亮,《从〈五经〉到〈四书〉:儒学典据嬗变及其意义——兼论朱子对禅佛思想挑战的回应》,见《东南学术》,2002(6)。

^③ 南宋·陈著,《本堂集》卷二《泌生日二首》之一。

曾捋虎须非苟合，得伸骥足更奚量。
四书尽有工夫在，仕学从兹道愈光。^①

五经四子非无道，二帝三王总是儒。
不必拘拘泥章句，帝王学与众人殊。^②

天回邹鲁生人命，地转江河造化机。
道在六经先四子，焚膏还欲继余晖。^③

仅就上述诗作粗略概括，便可见四书学的影响涉及修身、为学、科举、治国等诸多方面，既关乎一己，又关乎社稷。进一步讲，在很大程度上，《四书》不仅是学术要籍，也是治国宝典；四书学不仅是一种显赫的学术形态，在政治生活中也发挥了重要效用。由于《四书》在传播过程中很好地实现了学术经典与国家制度——如科举、学校——的有效链接，宋、元以来的“四书学”具有同时代其他学术形态无可比拟的强烈政治属性。正因为此，以四书学为对象展开深入探讨，既有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又有政治史上的认识价值。

然而，南宋、元、明、清四朝的政治、学术形势毕竟不同，四书学在历朝的传播与命运也有所差别。在南宋，尽管朱熹合《四书》，撰《集注》，作《或问》，在四书学史上有奠基之功，但由于他卷入了当时那场以韩侂胄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和以赵汝愚为代表的“理学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中，晚年遭遇“庆元党禁”，不但其本人饱受贬抑，最终在凄然中逝去，而且其学也因之被诋为“伪学”而遭禁

① 元·蒲道源，《闲居丛稿》卷四《贺杨世英治中新除》。

② 明·邱濬，《重编琼台稿》卷五《青宫勉学五首》之二，这里的“四子”与“四书”同义。

③ 清·陈廷敬，《午亭文编》卷二十《夜读四书有作》。